

東京的新型 青年社會運動 比較性的探索

Tokyo's New Youth Social Movement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倉田 徹*
Kurata Toru

摘要

2011 年日本福島核電站的極大事故催生了東京國會前的大規模反核示威活動，標誌了沉寂幾十年的日本街頭政治運動的復活。2015 年，有違憲之嫌的安保法通過在即，大學生組織「SEALDs」發動了成千上萬的民眾每個周末於東京國會前集會，要求政府撤回法案。日本的新型青年社會運動發生在世界（佔領華爾街、茉莉花革命等）以及東亞（太陽花運動、雨傘運動等）街頭政治活躍的年代，但其主題完全具備日本社會本身的獨特性。同時，與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不同，日本的青年社會運動並未能成功迫使政府接受其要求。本文將通過比較研究，試圖探討日本青年社會運動的特徵。

* 倉田 徹 日本立教大學法學部教授

收稿日期：2016 年 12 月 29 日；通過日期：2017 年 3 月 11 日。

關鍵詞

日本、互聯網、雨傘運動、青年社會運動、媒體

Abstract

On March 2011, a major earthquake in the eastern part of Japan caused a serious accident in the Fukushima nuclear plant. Thousands of Japanese citizens gathered in front of the National Diet building in Tokyo to join an anti-nuclear movement, heralding the revival of street politics in Japan after decades of silence. In summer 2015, national security bills (which many scholars claim as unconstitutional) were under discussion; thus, a student organization called SEALDs, comprised mainly of students from Tokyo universities, successfully organized protests every weekend near the National Diet. The protests attract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articipants demand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helve the bills. Japan's New Youth Social Movements occurred at a time when street politics were very active in East Asia (including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and worldwide (such as 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Jasmine Revolution), but the theme in Japan's protests focused on country-specific issues. Unlike their counterparts in Taiwan, however, Japan's youth movements failed to force the government to accept its demands.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struc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youth social movements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Keywords

Internet, Japan, Media, Umbrella Movement, Youth Social Movements

一 前言

2015年夏天，反對安保法案的人士於東京國會議事堂前

反覆舉行大規模示威。此活動由一批年輕人帶領，標誌着沉寂幾十年後日本學生街頭政治的復活。究竟甚麼原因引致了青年社會運動的復活呢？

本文主要探討兩個問題，第一是國際政治環境與日本社運的關係。街頭政治流行並不是日本獨特的現象。2011 年的「佔領華爾街」和「茉莉花革命」轟動全球，可以說，街頭政治流行是世界潮流所趨。同時，於 2015 年帶領反安保運動的日本學生團體 SEALDs 的成員，與台灣太陽花運動以及香港雨傘運動的領導人有密切交流，街頭政治在東亞的範圍內互相合作。然而，日本的運動的主題完全是日本獨特的議題。那麼，究竟日本的街頭政治與世界以及東亞的關聯性有多大？

第二是示威對日本社會的影響。與香港、台灣相比較，日本街頭政治運動所取得的成果很有限。太陽花運動成功贏取政府的讓步，雨傘運動後，「傘後組織」成功拿到立法會以及區議會的席位，而日本的反安保運動沒有得到那種可見的成果。日本以及東京的街頭政治到底面對了甚麼樣的困境？它對日本政治留下了甚麼影響？

本文首先概觀 2015 年的反安保運動，繼而分析 SEALDs 的特徵，接着從日本國內政治以及國際關係的宏觀環境、日本青年的社會情況、東京的城市特徵這三個角度，來探討日本街頭政治的局限。最後探討反安保運動留下的影響。

二 2015 年反安保運動和 SEALDs 的角色

1 安保法和反安保運動

2015 年 5 月 15 日，日本政府向國會提交《有助於確保我國及國際社會和平安全之自衛隊法等法律部分修正案》。該法案企圖擴大自然自衛隊的功能，包括：保護在外日本僑民、擴大聯

合國維和部隊的自衛隊任務、擴大日本受武力攻擊時協助美軍的任務範圍等。

其中爭論性最大的是有關協助美軍的內容。日本國憲法第九條有放棄戰爭的條款，以往主流憲法解釋認為，雖然日本的個別自衛權（即日本防衛日本）屬合憲，但發動集體自衛權，即日本的盟軍受攻擊時支援它而連同攻擊敵國屬於違憲行為。但政府於 2014 年 7 月 1 日做出內閣決定，認為行使集體自衛權合憲。此舉引起不少國民的質問，尤其是 2015 年 6 月 4 日，眾議院憲法審查會邀請三位憲法學者發言時，三位均說集體自衛權違憲，引致反安保運動大為擴大。由 6 月 5 日起，反對安保法案的學生團體 SEALDs 開始每逢周五舉行國會前抗議行動。有關團體如「反安保學者會」、「反安保媽媽會」等陸續成立，2015 年 8 月 30 日的國會前抗議活動有 12 萬人（主辦單位數字：警方統計為 3 萬人）參加（杉田敦、青井美帆、柿崎明二、木村草太、豊秀一，2016：頁 113-117）。

2 成功動員的原因

大規模街頭政治運動發生的原因是甚麼？尤其是一般認為不太關心政治的年輕人所成立的團體 SEALDs 通過甚麼辦法發展組織，促使反安保運動大規模動員的成功？

2.1 反核運動以來的經驗

首先，反安保運動的四年以前，日本發生了大規模的反核運動，反核運動影響了反安保運動。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大地震，東日本的太平洋沿海遭受巨大海嘯的襲擊，超過 2 萬人喪命。同時，位於福島縣的福島第一核電站受海嘯衝擊後停電，冷卻器發生故

障，導致機組爆炸，使福島縣以及周圍的東日本地區遭受大規模的核污染。

隨後在日本各地發生反核運動。2011年4月24日，東京澀谷5,000名市民遊行，這消息通過互聯網擴散後，反核運動的規模亦擴大。2011年9月，首都圈反核電站聯合會成立，開始舉行每周五晚在首相官邸前的抗議活動，2012年7月13日的高峰期有15萬人參加。首都圈反核電站聯合會於2012年7月29日發動「7·29脫離核電站國會大包围」活動，主辦單位聲稱共有20萬人參加了包围國會的活動。

在此次反核運動中，出現了很多新的運動旗手。金知榮對參加反核運動的312個團體進行調查，發現其中70個為以個人集合的方式組成的新團體。這些震災後組成的新團體成員，比震災前已存在的傳統組織成員年輕，專業人士以及家庭主婦的比率較高（金知榮，2016：頁85-99）。專業人士和家庭主婦於2015年反安保運動組織「反對安保法案學者會」、「反對安保法案媽媽會」等團體，在反安保運動中亦發揮了重大作用。哲學家內田樹認為，傳統市民團體的思想保守，且與很多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因而反應遲鈍，然而SEALDs和「反安保學者會」與政黨或其他組織沒有複雜關係，行動相當自由（SEALDs，2016：頁104）。

SEALDs成立的目的是反對安保法案，大部分成員曾參加2011年以來的反核運動，或由反核運動受到啟發。SEALDs的學生領袖奧田愛基於2012年夏天去看過反核示威，在聚會現場相遇認識的學生開始主動組織活動（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頁30-33）。2013年12月6日，國會通過被人懷疑以國家安全為由隱瞞政府信息的「特定秘密保護法」，為了抗議該法，那些學生當日成立SASPL（Students Against Secret Protection Law），起初成員只有10人左右，2014年2

月以後，SASPL 在東京新宿舉行數次遊行，已有數百人參加。

後來內閣做出集體自衛權合憲化的決定，不少人開始擔憂日本國憲法和平主義的危機。2015 年 5 月 3 日，即日本國憲法施行 68 周年的紀念日，SASPL 發展成 SEALDs (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 - s)。

2.2 利用互聯網

SEALDs 的組織結構是學生通過互聯網凝聚的橫向聯繫。2011 年以後的反核遊行亦利用社交網站、動畫網站、博客等交流工具。據金善美的調查，震災後活動的 305 個團體當中，77.7% 擁有自己的網站，利用電子雜誌、郵件列表的有 42.6%，利用 Facebook 的有 35.1%，利用 Twitter 的有 31.5%。積極利用互聯網的團體多數在東京附近，成員中 40-49 歲人士所佔比例較高。較少利用互聯網的團體中，總部在東京的不到兩成，成員中 50-69 歲的人較多。積極利用互聯網的團體亦在舉辦或參加示威活動、提供有關示威活動的資訊方面較為積極。金善美指出，積極利用互聯網的團體能夠聚集以前各自為戰的個人，在短期內實現爆發性的動員（金善美，2016：頁 123-128）。

SEALDs 亦是積極利用互聯網的團體。正如上所述，SEALDs 的前身 SASPL 是大學生奧田愛基和他的朋友成立的團體，2014 年 2 月 1 日他們進行第一次遊行時，SASPL 還沒有官方 Twitter，所以奧田通過他的個人 Twitter 發佈消息，成功吸引了 500 人參加（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頁 38-43）。他們在示威現場招募新成員時亦利用互聯網。每次周六示威結束後，成員向參加示威的學生尋問是否有意參加 SEALDs，與響應者當場交換 LINE 的帳號，開始聯絡。

2.3 低成本的運作方式

這種組織的運作成本當然很低，SASPL 剛成立時示威的經費全靠奧田愛基大約 7 萬日元的臨時工收入。租用音樂車約花了 3 萬日元，他們自己購買簡單的機器印 T 恤，印刷傳單則利用大學的免費複印。後來能夠由支持者籌得的資金越來越多，他才開始大量印製傳單、小冊子（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頁 71-72）。

他們平時在地鐵上用 iPhone 寫演講稿（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頁 45），每個月只開一次定期集會，只有約 50 人參加，其餘時間全部通過 LINE 交換意見。SEALDs 本身沒有正式的主席、代表、召集人之類（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頁 87-88），當然也沒有辦公室以及專職員工，可以以極低成本運作。

2.4 適合年輕人口味的口號以及宣傳辦法

SASPL、SEALDs 亦改變了遊行示威的形式。他們認為日語不太適合演講以及提出強烈主張，引進了說唱和街舞的元素。奧田愛基對於佔領華爾街的示威人士對 Tell me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的口號以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來回答相當感動，因為日本以前的運動沒有參加者以與領導者的口號不同的詞來回應的形式（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頁 63）。這些英文口號以及它的日譯「民主主義ってなんだ？（民主主義是甚麼？）」「これだ！（這就是！）」的口號在東京的示威中常被使用。參加 SEALDs 的女大學生芝田萬奈說，她參加反核遊行時，周圍的人全都是年長男士，覺得不快樂，但去 SASPL 的遊行與同齡的人對話很快樂（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頁 71）。

SEALDs 引進歐美文化的同時，亦對東亞有相當程度的親近感。SEALDs 與台灣的陳為廷、香港的黃之鋒等東亞年輕政治活動人士有着密切交流。SEALDs 成員本間信和說，覺得東亞的情況與自己的現實比較接近 (SEALDs, 2016: 頁 77-79)。

2.5 採用新的宣傳動員辦法

當然，SEALDs 成員人數遠不足幾萬人，為實現大規模示威，需要各種各樣的個人、團體自發參加。在這方面日本亦有反核遊行以來的經驗。在 2011 年 4 月的反核遊行中，由 2005 年開始舉辦各種遊行的團體「素人之亂」在網上免費公開名叫「第一次遊行」的小冊子，呼籲支持者轉載、派發。他們將海報、橫額等宣傳物登在網站任人下載，參加者亦利用便利店的複印機印刷圖像，用 Twitter 招募參加遊行的人 (五野井郁夫, 2012: 頁 100)。

當然 SEALDs 也利用了這些手段，但除了這些以外，SEALDs 是這幾十年來幾乎沒有過的新型學生團體，所以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亦大肆報道。表 1 為 2015 年 6 月以後《朝日新聞》有關 SEALDs、學者會、媽媽會的報道篇數。這三個團體均積極帶領反安保運動，但關於 SEALDs 的報道篇數較為突出。衣著時髦的年輕人使用流行音樂進行示威遊行的場面對日本來說相當新鮮，引起了媒體的注目。

表 1 《朝日新聞》報道篇數

SEALDs	學者會	媽媽會
683	95	235

調查辦法：利用《朝日新聞》資料庫《聞藏 II》(<http://database.asahi.com/index.shtml>)，以 SEALDs、學者會、媽媽會為關鍵詞進行搜索，調查由 2015 年 6 月 1 日到 2017 年 2 月 20 日的報道篇數。

三 日本街頭政治的局限

不過，儘管街頭政治運動這麼活躍，反安保運動的訴求未被反映到政策上。安保法案在反對聲下於 2015 年 9 月在國會通過。日本街頭政治運動的能力有限，理由何在？

1 國內政治以及國際關係的宏觀環境

與港、台比較，日本的政權較為穩固。根據 TVBS 民意調查中心「國內主要政治人物聲望調查」，太陽花運動後的 2014 年 4 月，對馬英九滿意的人只有 13%，而 71% 受訪者表示不滿意（TVBS 民意調查中心，2014）。雨傘運動期間的 2014 年 10 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調查，受訪者被問及「假設明天選舉特首，而你又有權投票，你會唔會選梁振英做特首」時，只有 23.5% 說會，而 61.1% 說不會（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6）。然而，安保法剛成立時（2015 年 9 月 20 日）進行的日本報道節目的調查顯示，安倍內閣支持率有 37.1%，不支持率為 45.4%。因強行票決被批評，支持率稍見下降，但 10 月 18 日已回復到 42.2%，高過不支持率（41.0%）（TV Asahi，2016）。

安倍內閣較為穩定，其背後有日本過去十幾年來的政治混亂。2006 年小泉純一郎辭職後，日本政治變得不穩定，每年有首相下台，政策停滯。2009 年日本失去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2011 年發生大震災。在「失去的 20 年」中，廣大日本國民對「不能做出決定的政治」失望。於是在 2012 年 12 月 16 日的眾議院大選，執政黨民主黨大敗，自民黨拿到總共 480 個議席中的 294 席而告大捷。選舉後就任的安倍首相高舉「アベノミクス（安倍經濟學）」的旗幟、「この道しかない（只有這條路）」之類的口號，強調除了自民黨的強勢

統治外沒有另外的選擇。安倍通過操縱金融引致日元貶值，使得出口商得益，成功改善經濟情況。

有關安保法的爭論裏，反對法案的人士提出的概念是「憲政主義」。憲政主義強調當權者需服從憲法，需要防止濫權。大多數憲法學者從憲政主義的立場，批評內閣擅自改變多年來的憲法解釋。但輿論支持政府強勢領導的背景下，批評政府亦被看作阻礙施政的做法。

根據 2015 年 8 月朝日電視台進行的調查，對安保法案贊同的受訪者只有 22%，反對的達 55% (TV Asahi, 2015)，該法案明顯是不受歡迎的。但對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影響有限，相信其原因之一是國民不太重視安保、憲法等問題。據朝日新聞於 2016 年 3、4 月進行了調查，就安保法通過後首次進行的 2016 年 7 月參議院選舉投票時重視的政策，最多人選擇的是景氣以及僱用。其次是社會保障、福利、提升銷售稅率等問題，均與經濟、民生有關，而最重視外交、安保以及憲法的人

表 2 2016 年參議院選舉時最重視的政策

	可選多項	最重視
景氣、僱用	67%	30%
社會保障、福利	65%	22%
提升銷售稅率問題	35%	8%
政府財政	27%	4%
TPP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13%	1%
災後重建	31%	3%
核電站、能源	27%	4%
教育、育兒	49%	9%
外交、安全保障	36%	6%
憲法	29%	8%

資料來源：《朝日新聞》，2016 年 5 月 3 日。

總共只有 14%。

同時重要的是國際關係的因素。太陽花運動反對加強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雨傘運動抗拒中國式民主，均帶有反中色彩。而安保法案的宗旨是應對「環繞着我國的安保環境的變化」，實質上它是意圖抵抗中、朝威脅的法律。反對安保法案的人主張，解禁使用集體自衛權會引致日本被捲入美軍在全世界進行的戰爭，但近幾年來日本民眾對美國的感情頗為正面，這種憂慮程度有限。其背後亦有東日本大震災的影響。地震發生後美軍開展「Tomodachi (朋友) 作戰」，積極參與賑災行動。此事在日本被廣泛報道，有效改善美軍形象。

港、台、日的反中情緒均在上漲，據日本政府的「2015 關於外交的民意調查」，對中國沒有親近感的受訪者達 83.2%，反而對美國抱有親近感的有 84.4% (內閣府，2016)。

同時，對日本左翼學生曾經領導的傳統學運的負面感情亦成為現在年輕人推動學運的障礙。日本民眾對學運的印象普遍負面，其轉捩點為反對 1970 年日美安保條約修改運動。1969 年學生佔領東京大學安田講堂並縱火，導致當年東大的入學考試被取消。1972 年聯合赤軍劫持人質佔據輕井澤的山莊，兩名警察以及一名市民被殺。政治學者五野井郁夫說，這些事件發生後，在日本示威本身成為了一種禁忌，很多人認為遊行「可怕」，參加遊行示威是「壞事」、「秩序的敵人」、「暴力」等等 (五野井郁夫，2012：頁 100)。結果，日本成為了罕見的「學生運動不發生的國家」(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頁 50-51)。正如 1967 年香港暴動淪為恐怖襲擊，不少人對工聯會等左派現在還持有負面印象，日本國內對日本共產黨的負面印象亦是根深蒂固的。

當然，SEALDs 的年輕人與共產黨沒有關係，亦不是恐怖主義者。但參加 SEALDs 的學生諏訪原健說，他回九州鹿

兒島縣的老家時，他的親戚說因他參加遊行「以為他參加了共產黨」（SEALDs，2016：頁 26）。香港學民思潮的周庭與 SEALDs 成員對談時提問，「好像日本不少人認為 SEALDs 等於日本共產黨，日本人不喜歡共產黨嗎？」，而 SEALDs 成員回答說，「共產」這一詞會讓人聯想到斯大林、毛澤東之類的獨裁者。他們說，SEALDs 舉辦活動時會邀請國會的全部在野黨，包括民主黨、社會黨等，但共產黨成員的發言偏偏在網上引人注目，不少人誤認為 SEALDs 是共產黨（SEALDs 編，2016：頁 30-36）。

SEALDs 成員因中國在南海的行徑、對西藏以及新疆的鎮壓、香港民主化停滯等問題對中國共產黨政權頗有意見，通過聲明屢次呼籲中國了解自由和民主的價值，此舉是為了應對進行反安保活動時被問「你們怎樣看待中國、俄羅斯等正在做的事情」。但有一天周庭在 facebook 上寫有關與 SEALDs 對談的事時，有部分日本人批評她，問「你成為了共產黨的女人嗎？」（SEALDs 編，2016：頁 47-49）。

2 日本青年的社會情況

受到這些日本的政治、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日本年輕人有着保守化的傾向。SEALDs 利用互聯網尋求支持的同時，亦在網上遭到類似於中國「憤青」的所謂「ネット右翼（網絡右）」的肆意攻擊。

近年來日本年輕人對自民黨的支持度節節上升，據朝日新聞 1976 年的調查，19-20 歲受訪者當中，支持自民黨的只有 18%，但於 2016 年參議院選舉時，18、19 歲的投票人中 40% 說自己投給自民黨，20-29 歲投給自民黨的更達到 43%，是所有年齡群組當中最支持自民黨的一群（《朝日新聞》，2016 年 9

月 30 日)。

筆者參考中文大學的學生刊物《大學線》的調查項目，對東京的 92 位大學生進行調查，日本學生對街頭政治的參與程

表 3 政治意識的日港比較

可接受以下抗爭手法的受訪者比例 (可選擇多項)			為爭取公義或民主，願意付出以下代價的 受訪者比例 (可選擇多項)		
	日本	香港		日本	香港
靜坐	52%	86%	付出時間、學業 (如罷課)	53%	80%
絕食	34%	55%	身受輕傷	25%	50%
罷課	50%	82%	犧牲前途 (如留案底、入獄)	5%	9%
示威遊行	68%	89%	身受重傷	3%	6%
集會	76%	88%	犧牲生命	0%	4%
語言衝突	45%	38%	構成社會大眾生活不便 (如交通擠塞)	41%	74%
肢體衝突	0%	21%	損毀公物	11%	47%
衝擊警察防線	5%	28%	向警察使用武力	5%	36%
其他激進手段 (如防火、擲磚)	0%	16%	使用武力傷及無辜 (如圍觀市民)	1%	10%
			導致他人死亡	0%	7%

資料來源：日本數字依據筆者由 2016 年 7 月至 10 月於東京的大學實施的調查，香港數字引自《大學線》第 124 期 (<http://ubeat.com.cuhk.edu.hk/124poll/>)。

度以及接受程度明顯比香港低。

日本學生的保守性不僅表現在政治方面。據一項對剛入職的新人的調查，在 2000 年說自己計劃終身於現在的公司工作的只佔 20.5%，但 2012 年同樣的調查中該比例上升至 60.1% (山田昌弘，2015：頁 14)。日本的著名社會學者山田昌弘分析說，1980 年代泡沫經濟時期，年輕人找工作並不難。但現在經濟情況大幅惡化，民營企業和公務員的僱用制度，即錄用大量大學畢業新生、終身僱用制以及結婚後女性靠男性的

收入生活的社會慣例幾乎沒變，不能成為終身僱用職員的年輕人以及不能與終身僱用的男人結婚的女人大幅增加。結果，年輕人所面臨的事實是，依賴大型機構的人得勝，而依靠個人能力而獨自行動的自由主義者吃大虧（山田昌弘，2015：頁 23-40）。據一項在日本、韓國、歐美同時進行的調查，說對自己的未來有希望的 13-29 歲的日本年輕人只有 61.6%，認為自己的參與可改變社會的人亦只有 30.2%，均為進行調查的七個國家中的最低（山田昌弘，2015：頁 235）。對自己沒有信心的年輕人加深對企業、長者甚至是國家的依賴，自然地支持政府。

「雨傘運動」亦被視為「世代之爭」，運動發生時，因對運動的看法不同，不少家庭的親子關係緊張。早於 2014 年 10 月 3 日，即運動第六天，香港已有報道說，因對運動立場不一，掀起家庭的矛盾與撕裂，有反對兒子支援佔領的父親要脅斷絕關係，有留守高中生誤觸胡椒噴霧全身通紅，怕被罵而不敢回家（《明報》，2014 年 10 月 3 日）。與此相反，日本的親子關係越來越和諧。據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與 Kinzai 出版社共同進行的一項高中生調查，回答與父親的關係良好的受訪者佔 78%，說與母親關係良好的受訪者高達 91%。山田昌弘認為，在日本高度經濟增長以及大眾文化流入的時代，不少家庭因親子間的價值觀不同而產生矛盾，但現在的父母已接受流行音樂以及漫畫等文化，親子之間的價值觀差異不大。然而，因親子關係密切，年輕人失去對外部世界的興趣（《朝日新聞》，2016 年 12 月 18 日）。

帶領 SEALDs 的學生中，有很多人持有與這樣的一般日本學生很不一樣的背景。SEALDs 的核心人物奧田愛基的父親是幫助沒有家屬的貧困人士的牧師，平時與露宿者、前犯罪者等人士一起生活，奧田愛基自己後來因不能適應普通學校而在沖繩最西端的孤島、山陰地區山村的特殊學校等地度過了青春

時代。牛田悦正的祖父是黑社會成員，父親沉迷賭博並早死，他經歷過與孤兒差不多的生活。芝田萬奈在紐約出世，回日本後未能適應，於是在美國上了高中（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頁 12-19）。因價值觀與一般保守的日本年輕人不同，他們冒險成立學運組織。不少人確實認為，參加遊行示威活動並不是「普通」學生的行動。溝井萌子上高中時獨自參加反核遊行，但她憶述當時她絕不敢向朋友透露這件事，因害怕被她們看作是怪人而和她保持距離（SEALDs，2016：頁 22-23）。

3 東京作為城市的特徵

最後想探討發生國會前抗議活動的東京作為城市的條件。它具有着對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有利的條件，同時亦有着不利的因素。

日本首都東京最大的特徵是巨大的人口。據聯合國統計，東京人口達到 3,814 萬人，遠比第二位的印度德里（2,645 萬人）多，是全球最大的城市（United Nations, 2016）。東京都市包含擁有超過 300 萬人口的橫濱市、100 萬以上人口的川崎市、埼玉市等大城市，多數城市無縫連接。和以邊境與深圳明確分開的香港不同，東京的邊緣並不明確。這種規模對新的政治運動來說，有利有弊。

首先，東京代表着日本文化的前沿，在有多樣的新文化出現的同時，它作為一個全球城市又吸收了不少世界文化。SASPL 活動的地點新宿、澀谷正是東京最繁華及新文化誕生的地方，進行抗議活動後，他們藉開派對吸引年輕人。同時東京作為首都，具有政治中心的功能，國會前是不可缺少的抗議活動地點。參加 SEALDs KANSAI（關西），以大阪為據點進行活動的大野至說，國會前是特意參加活動的人聚集的地點，在

那裏說話時大家會熱心傾聽，但大阪路上的抗議要讓行人駐足傾聽不易，條件大為不同（SEALDs，2016：頁 108-110）。日本媒體機構集中在東京，全國性的報道節目多涉及東京的題材（SEALDs，2016：頁 149）。

另一方面，東京亦具有困難的條件。首先，因在首都進行反對國家安保政策的運動，他們是試圖改變整個日本。SEALDs 的根據地在東京，他們自然會意識到這是全國性的運動（SEALDs，2016：頁 117），即需要動員日本總人口 1 億 2,000 萬人的運動。2014 年 6 月，佔領中環的民間公投吸引 72 萬人參加時，《環球時報》社論認為「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沒 13 億人多」。對此佔中發起人陳健民表示，香港政制發展涉及 700 萬市民，與內地 13 億人口沒直接關係（《明報》，2014 年 6 月 24 日）。同樣，SEALDs 的集會儘管能動員幾十萬人，但也距離 1 億 2,000 萬很遠。SEALDs 成員林田光弘認為，地方城市的優點是，儘管人數不多，如被認為是市民的嶄新行動，當地媒體會報道（SEALDs，2016：頁 233-236）。實際上，反核運動開始流行的 2011 年 5 月 22 日，《朝日新聞》高知縣版對在高知縣四万十市 21 日發生的 50 人遊行作過詳細報道。以東京為中心的關東地區集權程度特別高，鄰近地區如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等，幾乎所有電視節目都與東京一樣，沒有自己的電視台。東京雖然凝聚了全國的資訊，但關於東京本身的資訊密度卻很低。

四 反安保運動的成果

如上所述，反安保運動沒有成功阻止法案，SEALDs 於 2016 年 7 月的參議院選舉結束後解散。但這次運動對日本政治留下了某些程度的影響。

1 促進在野黨協調

帶領日本街頭政治運動的年輕人當中，成為政治家的人非常少。奧田愛基說自己絕不想當政治家（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頁 103）。SEALDs 是推動緊急行動的團體，沒人打算把它政黨化（SEALDs，2016：頁 37）。這一點與港、台很不同。

但 SEALDs 解散前，通過促進在野黨的互相合作，對 2016 年的參議院選舉發揮了影響。有些參議院選舉的選區只被分配一個議席（被稱為「一人區」），成為「單議席單票制」的選區。在這些選區，最有實力的政黨獨佔議席。在 2013 年的參議院選舉中，總共有 31 個選區為一人區，而自民黨贏取了其中 29 個議席，達成壓倒性勝利；最大在野黨民主黨的 19 位候選人則全軍覆沒。導致此結果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在野黨互鬥。有民主黨候選人的 19 個選區均有共產黨的候選人，結果兩黨所有候選人均落選。據朝日新聞的分析，假如在這 19 個選區，民主黨、共產黨等 7 個在野黨共同推出統一候選人的話，本來應該可以於 7 個選區得勝的。但民進黨（以民主黨為主體重組的新政黨）的部分成員對共產黨的看法很負面，雙方不易合作。

阻止安保法失敗的反安保運動人士認為，需要通過市民的力量，才能改變市民與政黨的關係。2015 年 12 月，包括 SEALDs、學者會、媽媽會的五個團體成立了「廢除安保法、恢復立憲主義市民聯合組織」，開始探討為了對抗強權實現在野黨合作的可能性。

市民聯合組織通過街頭宣傳以及媒體，強調在野黨合作的必要性，同時與政黨、工會等組織磋商，終於 2016 年 2 月 19 日，5 個在野黨舉行會議，同意進行協調（SEALDs，2016：

頁 191-195)。最後在 2016 年參議院選舉時，在野黨在所有一人區派出統一候選人，成功贏取 32 個一人區中的 11 個議席。由於歷史原因，政黨的互相合作並不容易，但這次 SEALDs 擔當像香港「民主動力」的角色，從議會外實現了政黨互相合作。

如上所述，日本年輕人保守化，越來越支持自民黨，但另一方面，有分析認為自民黨正在長期衰退的途上。社會學者小熊英二說，社會運動暫時未能直接在選舉中得勝，但這只是自民黨在低投票率的條件下靠組織票得勝而已。自民黨在農村的權力基礎，正隨着人口老化不斷衰退，在新一波社會運動面前，自民黨是一個快要沉沒的岩礁（小熊英二，2016）。假如自民黨的組織基礎持續衰退，在野黨的合作將來有可能產生很大的成果。

2 實現一個「市民遊行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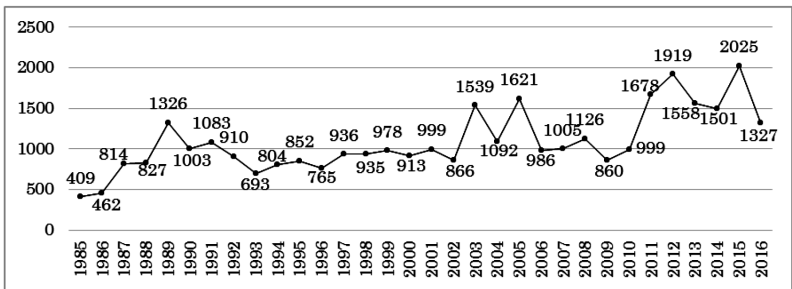
1970 年代反安保運動失敗以來，日本的遊行、集會非常低調。參加 2011 年 4 月 24 日遊行的著名哲學家柄谷行人說，之前 50 年自己沒參加過遊行（《朝日新聞》，2011 年 5 月 10 日夕刊）。柄谷說：「遊行絕對可以改變社會，因為通過組織遊行，日本社會就變成一個市民遊行的社會。」（柄谷行人，2011）

「市民遊行的社會」的意思應該是，市民認為遊行是一個較為普遍的政治行動的社會。在日本，多年來遊行示威持續低調，媒體也沒有意識到遊行示威的重要性。東京的反核遊行開始時幾乎沒有報道。2011 年 4 月 10 日，在東京發生了一次反核遊行，據主辦單位有 15,000 人參加，但《朝日新聞》於 4 月 18 日才在晚報的文化版刊登有關新聞。4 月 20 日的《朝日新聞》介紹一篇讀者來信，懷疑報紙、電視等媒體不作報道的態

度，之後日本媒體才開始更積極做出有關遊行的報道。

圖 1 為各年《朝日新聞》報道遊行的次數。1980 年代末東歐民主化的示威、2003 年伊拉克反戰遊行、2005 年中國的反日遊行均被多次報道。然而，2011-2012 年的反核運動後，有關遊行示威的報道大幅增加，於反安保運動發生的 2015 年更創新高，可以看到日本變成了「市民遊行的社會」。

圖 1 《朝日新聞》報道遊行的次數



調查辦法：利用《朝日新聞》資料庫《聞藏Ⅱ》(<http://database.asahi.com/index.shtml>)，以「デモ (demo, 即 demonstration 的日語略稱)」為關鍵詞進行搜索，調查報道篇數。但不包括通常指「示範」而不是「示威」的「デモンストレーション (demonstration)」。

五 結論

日本年輕人的街頭政治運動受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台灣太陽花運動、香港雨傘運動等各地社運的影響，組織結構和訴求等方面亦有類似的地方，然而日本的運動卻沒有取得成功。究其原因，從東亞的角度來看，值得注意的是，港、台的運動是反對中國擴大其影響力，而日本的運動反而是反對通過遏制中國擴大的安保法，因未能成功說服右派人士支持而失敗。

同時，在首都東京開展的運動需要以涉及到整個國家的運動，而不是以城市的運動的形式來開展，亦對推動運動不利。東京本身可以說是吸納日本全國人口而成的巨大移民城市，本

土意識較弱。與港、台比較，在日本，市民和政治之間的距離較大。

但 SEALDs 等團體成功迫使政黨在選舉中互相合作，從而對選舉結果產生了影響。加之，遊行示威變成比以前更常見的東西。奧田愛基亦希望有人繼承自己的運動（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頁 114）。在香港，由 2003 年的七一遊行到 2014 年的雨傘運動，需時 11 年。如果大規模的市民運動通過反覆來成為常態，日本今天的情況可以看作是一個變化的開始。現在對日本的新型街頭政治運動定論，可能言之尚早。

參考文獻

《明報》

《朝日新聞》

SEALDs (2016)：《民主主義は止まらない》，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SEALDs 編 (2016)：《日本 × 香港 × 台湾：若者はあきらめない》，東京：太田出版。

TV Asahi (2015)：〈安保法制〉，<http://www.tv-asahi.co.jp/hst/poll/201508/index.html>，瀏覽日期：2016 年 11 月 11 日。

TV Asahi (2016)：〈内閣支持率の推移〉，http://www.tv-asahi.co.jp/hst/poll/graph_naikaku.html，瀏覽日期：2016 年 11 月 11 日。

TVBS 民意調查中心 (2014)：〈國內主要政治人物聲望調查〉，<http://other.tvbs.com.tw/export/sites/tvbs/file/other/poll-center/20140506163407994.pdf>，瀏覽日期：2016 年 11 月 11 日。

山田昌弘 (2015)：《なぜ若者は保守化したのか：希望を奪いける日本社会の真実》，東京：朝日新聞出版。

小熊英二 (2016)：〈波が寄せれば岩は沈む：福島原発事故後における社会運動の社会的分析〉，載《現代思想》，2016 年 3 月號，頁 206-233。

五野井郁夫 (2012)：《〈デモ〉とは何か：変貌する直接民主主義》，東京：NHK 出版。

- 内閣府 (2016) 〈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 <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7/h27-gaiko/2-1.html>, 瀏覽日期: 2016年11月11日。
- 杉田敦、青井美帆、柿崎明二、木村草太、豊秀一 (2016): 《安保法制から考える憲法と立憲主義・民主主義》, 東京: 有斐閣。
- 金知榮 (2016): 〈担い手はどこから現れたのかー活動のきっかけと団体結成過程〉, 載町村敬志、佐藤圭一編《脱原発をめざす市民運動: 3.11社会運動の社会学》, 東京: 新曜社, 頁 85-99。
- 金善美 (2016): 〈ウェブメディアの活用ーインターネットが拓く新しい文化・参加のかたち〉載町村敬志、佐藤圭一編《脱原発をめざす市民運動: 3.11社会運動の社会学》, 東京: 新曜社, 頁 123-138。
- 柄谷行人 (2011) 〈デモが日本を変える——柄谷行人氏「9・11 原発やめろデモ」でのスピーチ〉: <http://associations.jp/archives/437>, 瀏覽日期: 2016年11月11日。
-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2016): 〈市民對梁振英出任特首的假設投票結果〉,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ce2012/vote/poll/datatables.html>, 瀏覽日期: 2016年11月11日。
- 高橋源一郎、SEALDs (2016): 《民主主義ってなんだ?》, 東京: 河出書房新社。
- United Nations (2016), “The World’s Cities in 2016”,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urbanization/the_worlds_cities_in_2016_data_booklet.pdf, accessed date: 11th November, 2016.